

通
讯
周
报

共产主义者

通讯周报第7期 2025年10月第三周
每日短讯合集.



联系我们：Leninists1917@proton.me
了解网站：bolshevikleninists.com

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官方网站:

www.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Telegram (电报) 频道:

<https://t.me/revcommunist0cn>

电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instagram.com/revcommunist0cn>

中国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没有受到影响”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并非真的“没有受到影响”，而是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暂时压住了直接的经济危机。事实上，当年下半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就已经出现大规模下滑的情况，11 月、12 月进出口总值已出现负增长，大量外向型企业倒闭，沿海地区出现了大规模农民工返乡潮，经济增速从 2007 年的 14% 迅速跌到 2008 年四季度的 6% 左右，硬着陆风险极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于 2008 年 11 月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并通过行政命令推动银行在 2009 年放出近 10 万亿贷款，形成了大规模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热潮。短期内，这些措施使 GDP 在 2009 年回升到 9% 以上，制造了所谓“V 型反弹”，并被宣传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也是“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证据之一。然而这种反弹的代价是让工人阶级陷入低工资和就业不稳定的窘境以承受危机，农民工返乡潮正是明证。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迅速膨胀，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问题加剧，一些中国学者也有指出这种刺激政策带来通胀和结构失衡的“后遗症”。因此，中国并不是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而是通过国家干预，把当下的危机转移到工人阶级身上，让资产阶级不承担过多的负面影响，从而把整体的经济危机的到来暂时推迟罢了。

浅谈革命运动的“指挥家”们

中文互联网中蛰伏着一批革命的“指挥家”们，每当国内外爆发了群众运动他们便会第一批显现。他们急不可耐地抢夺着话语权，要求革命运动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指挥发展，发表着自己的点评。这些“指挥家”们以要求、布局、盘算、大喊的方式在线上指挥着线下的、和自己毫无联系的行动。

在互联网上指挥革命的纸上谈兵性质不言而喻。这些个体的指挥家又或是成组织的指挥家们为了让自己能心安理得地把“不进行线下行动”的帽子扣给别的组织，他们做尽了除了线下行动外的一切，好让自己看上去处在革命的最前沿、声势浩大且影响力深远。关于革命组织和群众运动的关系，列宁在反驳《工人事业》报时是这样描述的：“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吗？”（弗·列宁《怎么办？》）。不过指挥家们似乎只看到了“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这一部分，因此决定要将自己置于实际革命运动的千里之外，而碰巧忽略了自己应当参与到运动之中、将“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这一部分。由此可见，这些指挥家们可能没有真正系统化的纲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与运动本身毫无联系、更可能是两者兼顾。

当然，这些指挥家们的弊病远不止“与实际的革命运动毫无联系”这一点，其中最具负面影响的便是功利主义思想。功利主义是和革命中“谨慎的、周到的、细致的和长期的准备”与计划相斥的倾向（弗·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面对群众运动，功利主义的指挥家们要求发动了抗议和罢工的群众通过他们在线上写就的口号向中共讨要政治自由；面对刚成立不到两三个月的左派组织，这些本身毫无线下根基的指挥家们则要求新组织的领导层立刻发动融工，将组织成员们打散至全国各地。**若是群众和左派组织们不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他们就单方面地在无人能听到的角落里敲起丧钟，把群众运动打成“落后的”、“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把各个左派组织扣上“毫无前途的”、“没有生命力的”等帽子。**相当直观的是，也许是因为这些指挥家们脱离现实的革命工作太久，只会发出功利的、幼稚的要求；也许是因为这些指挥家们仅在互联网上坐镇指挥，自己不需要考虑任何代价。我们必须点出，这些思想的横流都严重地忽略了革命的准备与计划等要素并负面地影响了无数革命组织的健康发展。

审视过去欧美的支持加沙的抗议活动——人道主义还是阶级斗争？

10月10日，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这项协议包括立即停火、以色列部分撤出加沙、双方交换人员等内容。这项协议向加沙地区透入了一丝过去两年里没有的光芒。巴勒斯坦的抵抗组织的抵抗为加沙地区取得目前的局面提供了基础，但显而易见，双方综合力量悬殊，没有国际力量的施压援助，包括以色列内部的反对者，现在的停火也不会到来。

以色列国家的盟友，欧洲与美国，原本大可不作为的漠视，保持与以色列的经济、军事合作，将巴勒斯坦人民的死亡当作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欧洲、美国的人民改变了这一切。它向世界证明，以色列及其盟友的战争，包括一直以来它们对巴勒斯坦人的战争，不是合理的事情。社会的有效动员，成功施压欧洲与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改变策略——立场从未改变，只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不再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以拥有以色列盟友的形式体现了。

然而，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没有改变。加沙新的局面背后反映的是他们正在谋求以新的巴勒斯坦存在的形式继续履行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利益。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大行其道。停火与新的局面，不意味着巴勒斯坦这个民族的历史就可以继续前进，它依然岌岌可危。如果国际的、他族的资本依然在巴勒斯坦地区自由地投资，也就是建立利益、建立支配，那巴勒斯坦民族的苦难还不会结束。

欧美的抗议运动并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就如同抵抗人士并没有为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资本渗透发过声音。我们常看到欧美主要抗议运动对加沙地区的议题是：“结束种族灭绝”、“允许援助物资进入”、“停火和平”等，并施压自己国家的政府结束与以色列的合作不提供以便利。这是人道主义的语言而不是阶级斗争的语言。他们对加沙地区存在的不加掩饰的、野蛮的、可以让最愚蠢的人都明白现状的暴力伤害作出反应，却只做出了人道主义的语言，并没有向巴勒斯坦地区与其土地上的民族悲剧性命运的根本敌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发起有力的斗争，更不用说为此制定纲领与作出计划。

但是，抗议活动并没有能作为阶级性的产物产生的同时，它本身却蕴含着无产阶级的能量。抗议活动表现出了社会群体对其政府的不信任，这里面包含有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腐朽、无能、残忍无情的抵触和厌恶。如果这个阶级能清楚地明白它对立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罪恶而虚伪，并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加沙战争引起的抗议活动才能真正地起到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铺路地作用。

不能过于乐观地把支持加沙的抗议活动轻率概括为阶级动员斗争的结果，也不能简单地将它们断定为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感动的活动。此外，绝不应该把抗议运动向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转化看作神秘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因此消极等待。不真正地站出来推一把，那么运动不会前进一步。清晰地看待它，方可知晓共产主义者当前的任务就是继续向更多人指出资本主义的错误，并用组织阶级而非组织同好的办法，组织起无产阶级。

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

今天的中国是处在一片虚伪的和平之中的，这给我们的革命造成了诸多的困难。

媒体被前所未有的牢牢把控、国家机器的监视扫描和注视着革命势力的一举一动。这导致在今天，共产党人无法将他们的主张公开地展示，中国人民无法得知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的情况，一切革命行动都无法高效地开展。

同志们，我们在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已经如此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我们还不能够让工人们秘密地彼此联络、让工人和党秘密地彼此联络，因而一切实践的问题都指向了一个问题：

我们要如何绕过中共的监视？

中国的劳动者实际上不被允许示威，不被允许罢工，不被允许组织起来进行任何革命的活动，我们的处境是如此糟糕，反革命的中国政府正在用行动告诉我们——

“是时候搭建劳动者之间交流经济或政治斗争的平台了。”

是的，我们有两件事情是已经摆在眼前的：

1. 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建立属于全体劳动者的，绕过监视的联络平台，尽一切办法让劳动者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一切理论、一切鼓动；

2. 我们的一切宣传都必须开始面向务实的无产阶级，再说一遍，面向正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阶级！

任何试图面向知识分子的，或是试图将工人们变为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试图用思辨和讨论推延、代替实际斗争的宣传，都只是砸向中共铁腕的棉花，看起来做了些什么，但实际上是在浪费革命的力量，是在误导革命，是在杀死革命。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要立刻围绕工人们最关心的东西——时薪、单件产品的薪资、加班薪资、社保缴费、医疗保险、辞退补偿、节假日、工作中的护具和保险……以及满足这些要求所必须的政治权利，和权力——开展鼓动工作，鼓动他们产生罢工的念头，鼓动他们罢工，鼓动他们更彻底地提出正当的诉求，鼓动他们不仅是反抗工厂、而且要反抗中共的政治统治！

为此，我们必须立刻寻找一切方式了解工人最微小的工作与生活的细节，为此，我们必须更密切地参与到工人的工作与生活之中，为此，我们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调查、去接触、去联络。

我们要立刻整合我们的人员与智慧，提出和执行一切可以绕过中共监视的革命行动，搭建和扩展我们宣传的平台，总之，我们要尽一切方式把上述的各种宣传送到工人眼前——他们必须可以尽可能容易地接触到我们的鼓动文章（或是其它材料）。

我们不能认为已有的任何报刊或网站已经做到了这件事，因为它们实际上没有将那些信息送到工人最容易接触到的地方——他们工作的场所，又或是他们的手机最容易浏览的页面。同时，我们在鼓动工人的材料上也是欠缺的，我们的鼓动材料应该放弃一切工人难以理解的语言，我们要贴近他们最迫切的利益诉求。

同志们，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我们才能真的开始联合广大无产阶级的力量，我们会终于发现开始将中共置于了四面受敌的境地。

为什么生产力提高，你却越来越劳累？

唯生产力论者、“工业党”们称颂着 21 世纪以来的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拾统治阶级之牙慧般重复着“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推动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陈词滥调。然而，生活在当下资本主义中国的普罗大众体会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诚然，高科技产品日新月异、迭代不停，但是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轻松，反而更加操劳、疲惫。

根据官方早就经过严格条件筛选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 6 年间，中国人的周平均工作时长不断增加，从 2018 年 9 月的 46.1 小时，增长到 2023 年 9 月的 48.8 小时。从趋势来看，突破 50 小时 / 周大关，指日可待。这个统计数据是否显示了蓝领工人的情况还不得而知。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资本必须通过雇佣工人来生产产品、产品投入市场、最终被消费者所购买来完成一次增值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工人的剩余价值构成了资本的利润，而利润除以资本投入即是利润率。为了占领更多市场、赚得更多利润，资本家将一部分篡取的利润用以扩大再生产、投入下一轮循环。但是，由于生产过剩、市场饱和，当今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多数产业的利润率都已降至极低。

这一利润率的危机使得传统制造行业的资本只能通过更甚以往的“内卷”模式，也就是不降反增的工作时长，来勉强维持利润率。

面对这一危机，当今的资本主义选择了两条逃逸之路：一是金融化，二是通过发展高科技，快速地占领新的差异化市场，并通过广告、营销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制造消费需求、满足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差异化需求来完成资本循环。因此，资本主义很乐意在这些满足少数人“高品质”生活的领域增加技术投入、促进技术发展。但是，一来由于其高昂价格，这些技术迭代并不能惠及大众；二来，为了在垄断市场上抢占先机，资本主义必须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压缩研发周期，那么解决方案便是“给两个人付三个人的工资，让他们干五个人的活”！

由此可见，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提高反而加速将工人拖入被异化的深渊。只有彻底地推翻这一体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让生产真正造福于普罗大众！

论反抗的总体性

认为在历史现象中，无论是进步的、退步的，还是中间的、插曲性的，所有新的历史现象都归因于“基本”力量的平衡，这将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错误（机械社会学的一个方面）；还需要看到基本阶级的主要群体（各种类型，社会 - 经济和技术 - 经济）与受霸权影响的辅助力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具体地分析一下，在当下的中国，资本主义统治地带的边缘出现的裂痕。房价下跌导致业主维权；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征地导致农民维权；学校教育管理制度的缺陷导致学生维权；欠薪导致的工人维权。在这些集体行动中，我们发现了政治的因素，它们当然不是革命，但也不是完全的反动，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在统治领域，它们也打破了令人窒息的国家凝固，并使一个不同且数量更多的个人进入国家生活和社会活动：这些运动也可以有相对“进步”的内容，因为它们表明在现有社会中存在着现有领导人未能利用的潜在活跃力量，即使是“边缘力量”，但并非绝对进步，因为它们不能“创造时代”。

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抗议无关紧要，这种不同类型的抗议是阶级斗争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要环节。如果我们深入观察，某些抗议将自己构想为边缘性的；也就是说，它们预设了一个主要的运动，可以在其中嫁接以改革某些假定或真实的弊病，也就是说，某些集体行动是自发的。这个原则具有政治重要性，因为理论上的真理，即每个阶级只有一个政党，在决定性的转折点上得到了证明，因为各种各样的团体，每个都将自己呈现为“独立的”政党，最终会联合并形成一个整体。之前存在的多样性只是个人结社性质的，即只涉及局部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劳动的分工（在其限度内是有用的），我们可以对政治劳动的分工进行一些分析，在政治运动的初期，工人仅是理论的接受者，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被期待承担的关键职责，是为工人阶级提供清晰的政治意识。他们被赋予艰巨任务：研究运动的问题与目标，应对并克服侵蚀工人政治意识的障碍、误解与歪曲。知识分子在运动中也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活动——从工人媒体和教育机构的技术智力服务，到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的议会代表。最终目的是使工人阶级从单纯的理论接受者（他们长期受制于经济剥削与意识形态政治支配），转变为能通过其历史阶段性载体（即特定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及哲学家群体）主动生产并应用科学知识的政治主体。每一部分都预设了另一部分（如政治意识的阐发与澄清与政治实践相辅相成）。在决定性的时刻，即夺权问题被提上议程时，统一就形成了，一个历史集团从旧的经济社团中突现，并有了自己运作的法则。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政党的建设中，必须基于一种“总体性”的性质，而不是次要问题，

因此要仔细观察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首领与群众之间是否存在同质性。群众需要知道自己的诉求以及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领袖，群众诉求的满足需要社会形态的彻底变革。如果在决定性的时刻，首领们转投他们的“真正政党”（以守卫过去的成果自居），群众就会被抛下，无所作为，毫无效果。可以说，没有任何真实的运动能够一蹴而就地获得其整体性的意识，而只能通过连续的经验，也就是说，当它通过事实发现，存在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在这个词的荒谬意义上），而是因为存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的消失并非没有后果。因此，运动完善自己，失去了任意性和偶然的特征，变得真正独立。

政治领袖应该在自己与群众之间激起一个过渡的平台，激起可能的竞争者和平等者，提高群众的能力水平，创造能够取代他作为领袖职能的元素。他根据群众的利益思考，而群众则希望一个征服和统治的机器不会因单个领袖的死亡或缺席而瓦解，使群众重新陷入混乱和无能。如果每个政党都只是一个阶级的政党，那么领袖必须依靠这个阶级，并从中培养一个总参谋部和整个等级制度；他必须努力使领导职能有机化，具有持久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有机化是一个运动中的“中央集权”，即组织与实际运动的持续适应，自下而上的推动与自上而下的命令的调和，从群众深处涌现的元素的持续融入到确保连续性和经验规律积累的坚实指导机构的框架中。可以说，这是一次长久的地下战，需要秘密准备武器和突击战斗人员。

共产主义是极权主义吗？

“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都不可避免地导向极权统治。”这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中发出的著名警告，这一论断极大程度上影响了许多未曾接触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对共产主义的认知，使其与古拉格、秘密警察和个人自由丧失画上了等号，而历史上的悲剧似乎又向我们“证明”了这个推断是对的。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事实恰恰相反，哈耶克把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都归同于斯大林模式，是混淆了目标和手段的论断，不可否认的是，斯大林模式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和经济实践上的实践手段是具有消极的一面的，包括但不限于僵化的官僚体制，以及党内民主的缺失，一切质疑声音都被粗暴地划为反党集团而被灭杀殆尽。**但是，哈耶克却把这种手段上的错误实践归结为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唯一结果，足见其“经济学”功底有多“良好”了，就连“政治学”功底也令人发笑——他单单以一个在建设上使用了错误手段例子来论证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唯一结果，其用心实在是显而易见——暴露了其资产阶级喉舌的本质。**

共产主义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什么权力的高度集中，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国家的消亡”，哈耶克所预言的那个无所不能、永久存在的利维坦式的国家，正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斗争目标。哈耶克所看到的“极权”，即是“无产阶级专政”，有趣的是，尽管我们还没讨论“无产阶级专政”在工人阶级民主的工作上做得如何，是否有犯上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单单是哈耶克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极权”，却把资产阶级专政看成了“自由”，就不难看出像这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庞是如何虚伪，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污蔑是如此用心险恶。就算是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仅仅是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恰恰是瓦解最后的阶级结构，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本身也将在最后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不是一个权利无限的超级国家，而是人人都能自由发展自身的、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

资产阶级喉舌对共产主义的污蔑也局限在了他们狭隘的经济视角中：**在他们眼里，市场是一个充满自发秩序和个人自由的领域，但是，除了那些垄断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那些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工人，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劳动吗？工人们真的自由吗？饥饿的威胁，失业的恐惧，资产所有者在权力上的绝对优势，怎么就不是深刻的、扭曲人格的强制力量呢？**那些污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极权主义的资产阶级，恰恰正是知道自己的阶级统治的真正本色就是对无产阶级实施专制统治，资产阶级甚至无法克服自己的狭隘视角，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资产阶级只能将其污蔑为自己所最了解的模样。

因此，将 20 世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手段产生的僵化的、过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视为共产主义建设道路的必然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误解。真正的讨论不应局限在哈耶克的警告，而是如和在一个超越了资本市场逻辑的未来，社会如何以更民主、更自由的方式来组织自身的生产和生活。